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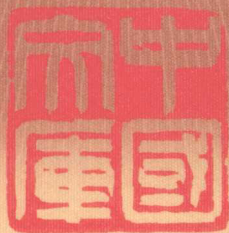
中国文库

· 哲学社会科学类 ·

中国奇迹

——回顾与展望

林毅夫 姚 洋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文库
哲学社会科学类

中国奇迹 ——回顾与展望

林毅夫 姚 洋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奇迹——回顾与展望/林毅夫, 姚洋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2

(中国文库)

ISBN 978-7-301-16574-4

I. 中… II. ①林…②姚… III. 经济—中国—文集
IV. F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5113 号

责任编辑: 梁鸿飞

整体设计: 翁 涌 李 梅

责任印制: 王铁生 单浩生

中国奇迹——回顾与展望

Zhongguo Qiji——Huigu Yu Zhanwang

林毅夫 姚 洋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http://www.pup.cn>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邮编: 100871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125

字数: 310 千字 印数: 1—4500

ISBN 978-7-301-16574-4

定价: 27.00 元



林毅夫

“中国文库” 出版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 20 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这些著作，对我国百余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 20 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分列于 6 个类别，即：(1) 哲学社会科学

类(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2)史学类(通史及专史);(3)文学类(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4)艺术类(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5)科学文化类(科技史、科技人物传记、科普读物等);(6)综合·普及类(教育、大众文化、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计划出版约1000种,分辑出版。自2004年以来,已先后出版三辑,每辑约100种,分精平装两类。2009年时值新中国成立60周年,特将“中国文库”第四辑作为“新中国60年”特辑推出,主要收选新中国成立60年来祖国大陆原创性人文社科类名著。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版式有所调整,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一套文库,千种书籍,庄谐雅俗有异,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况且,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读者在摄取知识、欣赏作品的同时,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

“中国文库”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共襄盛举。书目由“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审定,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领导同志担任顾问,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中国文库”,顾名思义,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这项事业就一定能够持续地进行下去,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

“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

“中国文库”第四辑

编辑委员会

顾问

(按姓名笔画为序)

于友先 邬书林 刘 杲 许力以 杜导正 李从军 李东生
杨牧之 宋木文 张小影 柳斌杰 徐惟诚 龚心瀚

主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委员

(按姓名笔画为序)

马五一 王 涛 王明舟 王瑞书 孙月沐 许 岩 朱杰人
李 岩 李 新 李 峰 李师东 李传敢 杨 耕 汪季贤
汪继祥 刘清华 何建明 何林夏 张增顺 宋一夫 宋焕起
吴尚之 吴江江 吴 斌 林国夫 孟昭宇 单占生 陈庆辉
贺圣遂 贺耀敏 郑宗培 姜新祺 祝君波 郭义强 郭 超
黄小初 黄书元 黄 闽 常汝吉 龚 莉 傅伟中 焦国瑛
董保存 樊希安 潘凯雄

“中国文库”第四辑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刘伯根

副主任 张贤明

成 员 （按姓名笔画为序）

于殿利 刘晓东 李红强 汪家明 林 阳

徐 俊 管士光

编辑组

李红强 乔先彪 唐 俭 何 奎 陆 源

前言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中国的经济保持了9%的平均年增长率。世界上从来没有另一个国家曾经在如此之长的时间内保持了如此之快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因此堪称奇迹。这个奇迹是如何实现的?它能否持续?本书收集的十五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解答。这些文章的作者均为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在2004年10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为庆祝成立十周年而举办的“中国经济展望”国际研讨会上这些论文获得了与会者的高度评价。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的四篇文章回顾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和中国经济转型的经验,下篇的十一篇文章则从金融体系、对外关系、农业和人口等方面对中国经济发展进行了展望。

上篇的四篇文章分别由哈佛大学经济系德怀特·帕金斯(Dwight Perkins)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经济和管理学院邵若素(Ross Garnaut)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以及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樊纲教授和香港大学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陈瑜博士撰写,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国经济转型的动因和式样以及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经验。

帕金斯教授的文章《从历史和国际的视角看中国的经济增长》考察了中国在整个20世纪的经济增长过程,并将之与国际经验相对照。他的结论是,中国政策开放之后的高速经济增长并没有突破国际经验所显现的常规增长模式。过去十多年关于经济增长的跨国研究表明,有利的地理位置、稳定的政局、较高的教育水平、较高的贸易开放度和较高质量

的官僚体系对经济增长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而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得好。帕金斯对中国过去五十多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进行了重新核算,并对之进行了分解。他的细致入微的工作为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新视角。

郅若素教授的文章《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源泉》是帕金斯教授文章的自然延续,回答了后者没有回答的问题,即中国经济改革为什么取得成功?既然增长经济学已经告诉了我们促成经济增长的政府政策,为什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采纳这些政策?郅若素教授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任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亲眼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初始阶段的巨变。和帕金斯教授一样,他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得益于对外开放;但他进一步认为,对外开放并不必然成为中国的选择。中国之所以选择了对外开放,是因为邓小平为代表的务实的领导层在 1970 年代末成为中国政治舞台的主导力量,而这一转变不仅恰逢其时,赶上了国际市场较为宽松的时期,而且也恰逢其地,因为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高速发展为中国树立了榜样。郅若素教授进一步认为,中国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和中国领导层的务实图变的态度关系极大。改革没有蓝图,这不是坏事,因为这样改革就不会被经验的框框所束缚。

林毅夫教授的文章《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经验》全面地探讨了中国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验,并将之与苏东的转型进行了比较。传统的苏联模式的经济体系是具有内部一致性的制度安排,赶超战略导致了扭曲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傀儡一般的微观管理单位。通过这套体制,一个资本稀缺的经济才可能动员资源建立起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但这是一个低效的经济。中国经济的转型始于赋予微观单位部分自主权,由此打破了传统体制的整体性。一旦传统体制的整体性被打破,制度变迁就将以自我推进的方式进行,传统的体制将被更有效率的市场体制取代。在此过程中,由于自主权的增加以及非国有部门的竞争,国有企业的效率会有所提高。但是,经济的活力主要来自于新的、小型的、非国有企业的大量进入。原来的计划配置机制和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逐渐失去了支持,最终被废弃。转型过程中,国家、企业和民

众有足够的时间适应新的市场体系。因为经济在整个转型过程中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大多数人是能够在改革中获益的。采用“休克疗法”的东欧和前苏联国家也试图用更有效率的市场体系替代效率低下的计划体系。但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则相对滞后而且进展缓慢,因而这些国家的企业构成与转型中的中国经济的企业构成是类似的,然而中国的方法并没有中断国有部门的生产行为,因此,中国的渐进方法取得了“休克疗法”没有达到的效果,却避免了相应的成本。

樊纲教授和陈瑜博士的文章《“过渡性杂种”: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制度转型》以“过渡性杂种”为分析框架,探讨了乡镇企业从兴起到消亡的过程及其决定因素。他们试图通过对乡镇企业发展历程的分析,解答下面的一些问题:一种制度的改革是如何开始的,又是如何依赖于或受制于其他制度的?在经济决策过程中,制度(包括思想意识)及制度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内生或外生的)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如何把“最优”和“均衡”这些概念和现实经济转型联系起来?一种“次优”状态能否通过内生的推动力转化为“最优”状态?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尚未被经济学家充分研究,对象乡镇企业这样的“新生物种”的关注会为制度经济学增添新的研究内容,并且有助于将制度经济学纳入现代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框架之中。

下篇中的十一篇文章对决定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四个关键性领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四个领域是金融体系、对外关系、农业以及人口。金融体系是少数还未进行深入改革的领域之一,由于大量坏账的存在、高度的集中性以及监管制度的薄弱,金融体系是中国经济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兴起改变了东亚和世界制造业的格局,中国巨大的贸易和资本双顺差既对国内经济运行产生了压力,同时也增加了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摩擦,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和资本账户的开放成为国际关注的热点问题。农业是中国经济中最落后的部门,却承载了中国 60% 的人口,如何加快农业的工业化,是中国在 21 世纪必须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不得不面对人口迅速老龄化的问题。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每个国家高速发展的阶段一定

是人口增长率较高、人口结构较为年轻的阶段,人口红利是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条件之一。相形之下,中国过早地进入了老龄社会,这将大大约束中国未来的增长潜力。下篇中的十一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以上四个领域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下篇中有五篇文章讨论了金融体系问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平新乔教授和他的三位学生范瑛(耶鲁大学博士生)、郝朝艳、毛亮(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生)的文章《中国银行业的管制和竞争》对中国银行业的管制和竞争状况进行了总结和描述。他们认为,中国银行业仍然是一个由国有商业银行垄断的行业,竞争虽然已经开始,但由于政府在银行业的准入和监管方面设置的种种限制,外资银行与国内非国有的民营银行的业务扩展还是比较缓慢的。无论是在银行资本、信贷市场,还是在中间业务上,国有商业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仍然占据绝对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尽管在银行业上政府是严加控制的,但并不是在所有方面政府的监管都很严。在个人信贷,尤其是在个人住宅抵押贷款与汽车信贷上,中国在2004年6月之前的管制都是偏松的。政府管制加上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导致了银行资本效率偏低、不良贷款比率高、资本充足率低等在风险管理与效率方面的问题。不仅如此,长期的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相对封闭的银企关系,使中国的银行业的业务内容与经营模式缺乏创新,银行中间业务与消费信贷至今发展缓慢,服务水平也有待提高。在加入WTO后面对金融市场全面开放所带来的挑战,中国银行业在管制与竞争方面需要进一步改革。

林毅夫教授和法国图卢兹大学的李志赟博士的文章《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改革》探讨了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体系改革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中国金融体系重建、发展和改革的每一步都与其他经济部门的改革紧密相关,而中国金融体系诸多问题的根源,也与实体经济部门改革问题的根源有一定的关联。市场化改革使国有企业所承担的政策性负担由隐性变为显性,政府需要对这些由于政策性负担造成的国有企业亏损负责。为了控制整个社会的金融资源,政府就必然要对金融体系进行垄断,这就导致了中国金融业的市場集中度很高,银行贷款大多都

贷给了国有企业,而股票市场的上市公司也大多是国企;此外,为了利用金融资源去补贴国有企业,政府就必须人为地压低金融产品的价格,这包括银行利率以及股票市场的市盈率,这也就使得中国金融产品市场化定价的改革难以彻底。

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联涛博士的文章《经济增长的最优金融结构:来自东亚的经验教训》回顾了东亚金融发展的经验,并讨论了这些经验对中国内地的借鉴意义。他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来观察东亚金融结构的演变。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比较年轻,那么它可能更关心增长率而不是资产和收入的保值。但是,随着亚洲人口开始进入中年,金融系统更应该对老年人的需求做出反应。亚洲的银行系统开始为消费者的需求融资,比如住房抵押贷款和消费信贷,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香港地区更注重建立满足老年人需求的保险基金、养老金和退休基金等金融产品。

中欧国际商学院、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张春教授的文章《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讨论了发展阶段和最优金融结构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这种关系对于中国金融改革的意义。他首先讨论了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和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的优势和劣势。在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中,投资者在获取投资信息和对公司的管理方面都存在搭便车现象,而且市场具有高流动性,从而不会鼓励投资者对绩效差的公司进行管理和采取行动,造成投资者目光短浅。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的优势是分散的投资者具备信息优势,可以鉴别出项目的优劣,而且他们面临高度的预算约束,从而可以避免道德风险。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的优势是大银行有动力去收集信息并更有动力去参与管理,从而可以克服搭便车问题,劣势是银行受到政府的管制和保护,会采取更具冒险性的贷款,从而产生道德风险问题;并且,银行不能处理分散投资所需要的信息,从而不能做出正确的投资判断。一个国家究竟采用哪种金融结构,与这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有关。在经济发展早期,银行放贷的对象是一些赢利状况比较清晰的企业,因此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是合理的,但随着经济变得日益复杂化,银行在处理信息方面的劣势变得显著起来,市场主导型

金融结构就更适合一个国家的发展。张春认为,中国过去采用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是正确的,但目前已经到了发展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的时候。他对如何建立一个完备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方星海博士的文章《证券市场改革、稳定和一个方案》提出了稳步发展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方案。他的出发点是金融改革的“增长折现法”,就是“把今后的增长折现成今天的价值,用以弥补过去产生的损失,弥补后推出改革,改革后再规范地发展”。按照此法则,结合当前实际情况,方星海提出了证券市场改革、稳定和一个方案,即适当借助证券市场外的资源,用以弥补证券市场本身的价值缺损,从而迅速稳妥解决股权分置和市场化发行这两大难题,为证券市场长期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下篇接下来的三篇文章讨论了中国经济增长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资本账户开放顺序和汇率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黄朝翰(John Wong)教授的文章《中国经济强劲增长对东亚的影响》讨论了中国经济增长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一方面,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东亚经济的火车头,东亚经济围绕着中国这个“世界工厂”进行了重组,东亚开始向中国大量出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另一方面,中国的高增长和高出口也对欠发达的东盟国家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及向第三国市场出口制成品上,这些国家遭遇到了中国的正面竞争。为化解东盟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担忧,中国政府迈出了大胆的一步,与东盟建立了自由贸易协定,随后,“10+3”(东盟加中国、日本、韩国)机制建立,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开始走向成熟。

日本大阪大学经济学教授高木信二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施建淮副教授的文章《中国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战略》探讨了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前提条件和开放顺序。他们认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必须满足四个前提条件,即稳健的财政、健康和富有竞争力的银行部门、利率市场化和灵活的汇率制度,而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现这四个条件,因此需要时间进行渐进式的推进。高木信二和施建淮进一步提出了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时间表,划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2年):取消对外直

接投资的限制,实现机构和公司进行国际证券投资的自由化;第二阶段(2年):除短期债务工具的出售外,取消其他证券投资流入的限制,取消对金融机构对外商业借款的限制,取消对初级证券发行的限制;第三阶段(1—2年):在流入和流出两个方向上都取消对证券发行的限制,实现包括个人在内的居民证券投资的自由化,放宽国内非金融企业的对外商业借款;第四阶段(2年):取消所有剩下的限制,并代之以审慎的规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黄海洲和普里扬卡·马尔霍塔(Priyanka Malhotra)博士的文章《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来自亚洲发展中国家和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研究》对汇率制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经验研究。他们发现,在欧洲,实行更加自由的汇率制度的国家的长期经济表现更好,而且,经济增长的波动不取决于汇率体系的选择;而在亚洲,实行更接近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的长期经济表现更好,并且经济波动较低。由于工业化国家通常市场比较完善,尤其是金融市场比较深化,因此它们可以更好地应对金融冲击以及实体经济变量的冲击,从而浮动汇率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亚洲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金融市场深化程度还不够,并且市场也不完善,从而不能有效应对冲击,因此它们的经济增长率依赖于其汇率制度的安排。尽管固定汇率制度对经济增长具有部分增强与部分消减的双重作用,但浮动汇率制度会带来“浮动汇率恐慌症”,而固定汇率可以保证政策的可信性,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些结论对中国汇率制度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下篇最后三篇文章分别讨论了中国农业、人口结构和储蓄的关系以及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农业与资源经济学系罗思高(Scott Rozelle)教授和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研究员的文章《中国的农村经济与通向现代工业国之路》接着回顾和分析了中国农业的可持续问题。他们首先分析了中国农业生产力的源泉及其可持续性,然后研究了农村市场的发展对农业专业化的影响,最后研究了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和作用。他们的结论是,由技术进步导致的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将是提高农业部门收入的主要因素,农村市场正在明显地实现一体化,土地租赁市场虽然出现较晚,但

是,它的迅速发展已经导致效率和公平两方面的改善,土地开始向专业农户集中,而且那些土地较少的农户也从土地市场获得了更多的土地。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舒尔茨(Paul Schultz)的文章《人口结构和储蓄:亚洲的经验证据及其对中国的意义》回顾了亚洲国家人口结构和储蓄的关系,探讨了人口红利存在的可能性。莫迪里安尼的生命周期储蓄假说预测储蓄将随着一个国家人口的年龄老化而下降,经济增长也会随之下滑。但是,这个理论忽略了经济和社会制度对于变化世界的适应能力,忽略了家庭重新分配资源、协调生命周期行为以及通过合理安排生活来提高家庭成员福利的能力。舒尔茨回顾了对亚洲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发现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这些国家和地区储蓄的长期上升是由于 20 岁至 59 岁人口比例的上升造成的。他的这个结论的一个含义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

和舒尔茨教授比较乐观的态度相比,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毅教授在其文章《中国人口老化、退休金缺口与农村养老保障》中则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表达了一定程度的担忧。他首先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概要的阐述与讨论,然后专门讨论了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显著高于城镇,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尚未建立,大多数地区几乎是零,养儿防老实际需求导致出生性别比与女婴死亡率大幅超常偏高。针对这些问题,曾毅探讨了建立农村储备积累式养老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他讨论了充分利用今后十五年左右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少儿抚养比大幅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与老年抚养比仍然较低而形成的“人口红利”机遇,大力发挥我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在努力建立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结合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同时,继续发扬中华民族尊老爱老与家庭养老的优良传统,为应对 2020 年之后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到来的严峻挑战早做准备。

回顾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所走过的路,我们发现,中国所选择的制度变革路径和发展战略基本是正确的。本书上篇四篇文章的作者虽然对一些细节问题存在分歧,但他们都一致同意,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并最终获得成功,和中国领导人的务实精神

以及对待问题的谦虚态度是分不开的。务实和谦虚引导中国采取了一种渐进和分散的改革和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功。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存。和高速的经济增长以及其他领域的剧变相比,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严重滞后,并有可能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导火索。但是,危机也意味着机会。中国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体制变革所释放的能量,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本书所收集的五篇讨论金融体系的文章从不同的侧面为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提供了有益和新颖的建议,这些建议对于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亚洲和世界制造业格局围绕着中国这个“世界工厂”进行了重组,中国成为一个制成品中心,而亚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原料和中间品的出口地。这个重组既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也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挑战。

本书能够顺利出版,首先得益于福特基金会对研讨会的财政支持。我们在此深表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梁鸿飞先生为本书的编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没有他的工作,本书的出版是不可想象的。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林君秀女士也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我们在此一并感谢。最后,我们要感谢所有文章作者和研讨会的参与者,他们是本书的主角。

林毅夫 姚 洋

2005年12月29日